

## 贾平凹作品《高兴》英译的社会学分析

李若楠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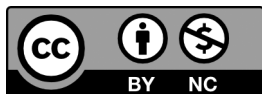
**摘要** |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视角下, 场域的变化、资本以及译者的惯习等因素会对翻译产生影响, 社会学的发展指引我们在广阔的社会语境的视域下探寻文本。《高兴》是贾平凹酝酿五年、增删六次、批阅三载而成的一部苦中带甜的现代中国梦, 真实刻画了乡土文学的原貌。《高兴》经汉学家韩斌翻译后于 2017 年在 Amazon Crossing 出版, 这是一种由“西方汉学家发起并翻译 + 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模式。本文立足布迪厄社会学视域, 试图从场域的变化、资本以及惯习等方面对韩斌英译本《高兴》进行分析。

**关键词** | 布迪厄; 社会学; 《高兴》; 韩斌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一、引言

《高兴》是一部充斥着社会剧烈变化的现实主义小说,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作者贾平凹以其一贯的淡定笔致铺展开来一副令人缭乱或战栗的生活画卷, 呈现出一个密布着冲突、错位、病象重重而又情切至深的当代故事。一个总认为自己“贵气的”, 注定要当“西安人”的农民刘高兴跃然纸上。给读者一幕欲哭无泪、渴望歆歆的人间舞台。这种“乡土风格”往往需要抽丝剥茧方能探析到最深刻的社会矛盾。瑞典翻译家曾经认为《高兴》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存在主义小说。主人公刘高兴极力突破身份桎梏去努力融入城市生活, 在“不高兴”的磨难和淬炼中却“高兴”地挣扎着。他划着生活的断浆出发, 在最不干净的地方过着最干净的生活。体现了作者“心怀天下不平事, 意念人间疾苦情”的情

怀和对“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的呐喊。语言幽默风趣, 无不透着智者的光芒。

学界目前对《高兴》的英译研究主要有: 车明明和崔落梅(2020)运用文化诗学理论对韩斌《高兴》英译本中的美学风貌、文化内涵和文化诗性进行探析, 以期证明文化诗学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王鹏里(2019)以勒弗菲尔的操控论为理论依据, 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方面对《高兴》英译本进行研究, 希望对《高兴》英译研究以及贾平凹其他小说英译研究提供参考。梁红涛(2019)从选材、接受效果等方面对贾平凹《高兴》与《土门》的英译进行对比研究, 认为要在实现“文化输出”和“读者接受”间进行有机协调。邵霞和马会娟(2020)基于贾平凹《高兴》的方言功能, 指出方言翻译的过程就是地域性与异质性磨蚀的过程, 原文的风格和语义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可见, 学界对《高兴》

英译本研究的规模种类较小,视角相对单一。鉴于此,本文立足布迪厄的社会学视角,试图从《高兴》英译本成功的因素简析出发,从场域、资本、和惯习三方面对韩斌英译本《高兴》展开探析,旨在解读世界文学场域的变化、译者、原作者、赞助人等的资本、以及译者惯习对中国小说外译的影响。

## 二、《高兴》译作成功因素剖析及布迪厄社会学概述

### (一)《高兴》译作成功因素剖析

贾平凹的作品《高兴》于2007年出版,译者韩斌经过多次与原作者沟通、与亚马逊跨文化出版事业部(Amazon Crossing)接洽,且经过多次试译于2017年完成了英译本 *Happy Dreams* (《高兴》)。该英译本于2017年在北京举行了全球首发仪式,这是亚马逊第一次为华人作家举办全球性的英文版首发活动。该书也是今年唯一一本入选 Kindle First 项目的中国文学作品。《高兴》经亚马逊出版后,在英语读者群体中获得高分好评,成为贾氏小说译出的作品中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截至2021年5月20日,亚马逊评分3.7分(满分5分)共获得542个全球评分,其中5星评分占37%(见图1)。*Happy Dreams* 在 Goodreads 网站上也获得高分好评,同时还获得纽约时报等报刊界的一致好评,这些评价明显高于贾氏其他英译作品(梁洪涛,2019:91)。

#### Customer reviews

★★★★☆ 3.7 out of 5

542 global rat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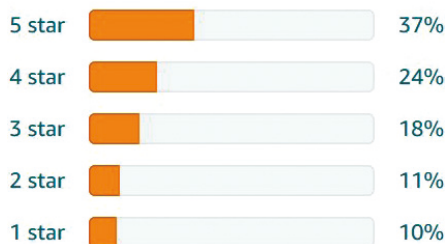


图1 亚马逊官网读者对英译本 *Happy Dreams* 的评价星级

谈及译作 *Happy Dreams* 成功的原因,主要有四:其一,它的译介契合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贾氏作品在英语读者中的推广,以往都是以外

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为主导的国家译介行为,由国家挑选篇目、译者,通过《中国文学》期刊和“熊猫丛书”出版(吴贇,2013:72)。而《高兴》是由西方商业出版社发起并出版,属于目标文化精准“输入型”译介和传播,是当前西方国家译介中国文学的主流做法之一,也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首选模式。其二,Amazon Crossing 依循读者本位、最大程度实现“市场效益”的选材宗旨,而且考虑到中国作家在西方文学场域的声誉、作品本身的“内力”,即其文学水准和在西方图书市场的适销性,最终促成了译作的成功。其三,作品本身体现出的普世价值。亚马逊中国副总裁艾博儒认为:“之所以选择《高兴》这部作品,是因为它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刘高兴面对命运的不屈不挠,展现了生活的幽默和悲怆,幸福是所有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这点上,《高兴》对所有读者都有吸引力。”(转引自杨晓芳,2017:1)《高兴》一反以往的“政治说教”色彩,能够更加迎合英语读者群体的口味。贾平凹对人性之高贵进行深切地阐发使得小说具有强烈的人类性和共通性,他笔下的刘高兴已经超越了那个生活在西安城里的刘高兴,他的人性之光已经跨越民族与国家界限而与异域读者的心灵相连。其四,译作 *Happy Dreams* 能够“走出去”还归功于英国译者韩斌(Nicky Harman)以“读者为归依”的翻译策略、作者贾平凹的声誉及文学影响力,它们保证了该书的畅销性。另外,Amazon Crossing 的国际知名度及其所依托的媒介载体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其能够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成为贾平凹众多小说译本中认可度和接受度最高的一部。

### (二)布迪厄社会学概述

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提供的图景是结构与人的关系,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适的中介,力图通过外部行动者在社会空间所占据的位置“场域”(field)、行动者行动的动力资源“资本”(capital)以及内部揭示构建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判的“生存心态”(habitus,即惯习)三个概念范畴,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Wolf,2007:26)。

场域是现实社会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布迪厄、华康德,2004:

133)。资本表现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每一类下还可以进一步划分;这些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布迪厄,1997:192)。

惯习主要是确定一种立场,即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其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 法,……(它)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布迪厄、华康德,2004:164-165)。惯习是一种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而采取某些有规律可循的行为;换句话说,他们将社会惯例内化在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之中,这些行为继而又直接或间接地或大或小地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这种既被环境塑造、又影响环境、不断与环境互动的思维和行为特点,就是布迪厄所说的“惯习”。惯习是历史的产物,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进化、改变或维持自己的思维方式、习惯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王悦晨,2011:7)。

### 三、《高兴》英译的社会学分析

许均(2003:69)认为:“翻译活动之所以存在,或者之所以有必要存在,是因为不同语言的人之间需要交流。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必定具有社会性。”翻译研究“近些年来正在经历着一种“社会学转向”(Merkle,2008:175)。由此,本文立足布迪厄社会学视域,从场域的变化、资本、以及惯习等方面对《高兴》英译本作一探析。

#### (一) 场域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与影响

布迪厄认为翻译是一种折射率较低的场域。因此,周边场域和权力场域相互渗透。我们可从内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场域的变化,其中外部因素研究即对文本之外关于赞助人、翻译模式、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或译作接受度等因素的研究。翻译社会学是将翻译看作一种社会行为,在特定社会语境下,以翻译是一种受社会诸因素调节的活动为理论基础,对翻译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参与其中的社会行为者进行分析的翻译研究(武光军,2008:76)。从场域方面来看《高兴》英译本。首先,世界文学场域发生了变化,前有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刘慈欣获雨果奖,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为中国文学获得国外认可积累了一定的象征资本,改善了其长期以来其所处的边缘位置。其次,立足世界整体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国际

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声音”越来越被世界各地倾听和认可,亚马逊出版公司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战略信号,助推其外译传播。再者,《中国文学》期刊及其“熊猫丛书”项目一直是推动中国文学外译的主流,随着近年来中国政府及各类学术组织或团体力图使中国文学“走出去”,如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合作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09年由陕西省作家协会发起并实施的“陕西文学海外翻译计划”、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推出的全英文的中国文学杂志《路灯》(Pathlight)等(王建开,2012:17-18)。“纸托邦”每年都会在统计的中国文学图书中选择符合目标读者期待的作品进行翻译。作为“纸托邦”成员及创始人之一,韩斌是基于她对中国文学和小说的浓厚兴趣而英译《高兴》的。以当下“一带一路”倡议大语境下进行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视域来看,韩斌所译《高兴》真实再现了贾平凹所要传递的黄土地的风土人情(刘桂杰,2019:79)。

因此,综上所述,由于文学场域的变化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行的影响,以及其他综合场域作用下,《高兴》英译本采用了由西方汉学家发起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的这种模式,收效甚好。

#### (二) 资本对于《高兴》译作的推介与影响

资本表现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还有象征资本。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进入公众视野并能为大家所青睐,和整个翻译活动中的各个要素是分不开的,要综合考量出版社、赞助人、发起人、译者等各个要素的联系。《高兴》译作的资本因素可从以下方面探寻。首先是出版商方面,Amazon Crossing是一家商业翻译出版商,具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就*Happy Dreams*的发布流通而言,亚马逊在其全球14大站点采用了纸质书和电子书同步的发行方式,纸电同步使该书可以即时送达183个国家的亚马逊读者,而传统的方式需要去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逐个谈线下的出版发行公司。相比之下,亚马逊的这种数据支撑以及全球布局极大地提升了发行的规模与速度(王阿静,2020:79)。其次,是符号资本。亚马逊出版公司在评估某一严肃文学作品能否“可选”的主要考量它能否为译语读者所接



受,是否能立足于精准的市场定位去发挥其市场效益。市场化翻译受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调节,译者或翻译公司与客户之间是自由选择的关系,而不是制度化翻译下的赞助关系。因此,出版社在遇到中国文学作品时,会考虑中国作家在西方文学场域的声誉,即符号资本,他们还会考量作者的文学水准及在西方图书市场的适销性、译文的质量或风格、译者在场域的“占位”,而《高兴》作者贾平凹著作颇丰,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作品《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法国《新观察家》杂志把贾平凹列入1997年“世界十大杰出作家”。2003年,贾平凹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以褒扬他在法国的巨大影响力(吴赟,2013:77-78)。也就是说作者自身已经积累了丰厚的象征资本,这一点对亚马逊出版公司具有吸引力。而Amazon Crossing的创始人Sarah也曾直言,亚马逊跨文化出版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更多的作家畅销作品,特别是当代文学“经典”译介给英语读者。这里也可以看出亚马逊选材时倾向于选择具有较高象征资本的作家作品。最后是译者的文化和象征资本,当译者在翻译场域中积累了足够的象征资本,也便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翻译是主导语言写作的作家获得世界文学场域认可的重要手段,而这取决于出版商、译者、评论者等认可行动者(consecrators)在世界文学场域中占据的位置,即拥有的符号资本。如严复在他翻译的《天演论》中提出的“信达雅”已经成为翻译理论中比较成熟的翻译原则;还有钱钟书的“化境”以及傅雷的“神似”都在无形中成为20世纪翻译场域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原则,这也都归功于他们于无形中在文学场域颇有建树的背后形成的象征资本。译者韩斌(Nicky Harman)是英国作家协会下属的翻译协会联合主席,她于2008年8月在《卫报》(Guardian)发表了《高兴》英译节选,表现出对贾氏作品的浓厚兴趣,韩斌从事20多年的汉学家翻译工作,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翻译,组织翻译主题活动,她与Helen Wang共同创立“中国小说俱乐部”指导新译者。在网络出版方面,她成立了一个名为CHINA.FICTION.BOOKCLUB的读者小组,讨论关于翻译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网站,同时附有Twitter,

每个月会进行学术文献讨论等。她曾为《茶:亚洲文学季刊》《天南》文学双月刊及《文字无国界》等杂志供稿。综上所述,译者积累了深厚的文化资本。作为“纸托邦”核心创始人,她说:“我们的纸托邦(Paper Republic)把中国的文学作品介绍给英语读者,连续两年获得伦敦书展的文学卓越奖。评委们认为,纸托邦填补了重要空白,给想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人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转引自高园,2019:81)她还获得过美国笔会翻译基金奖、入选过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她翻译了多位中国作家的小说、非虚构文学及诗歌,其中包括虹影的《英国情人——K》、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张翎的《金山》、韩东的《扎根》等。她还曾因翻译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倒流河》获得2013年中国翻译大赛一等奖(刘桂杰,2019:77)。她和另一位译者Dylan Levi King共同翻译的贾平凹作品《秦腔》有望在2021年面世。所有这些都为译者积累了深厚的象征资本,足够的象征资本也能够提高其译作知名度和认可度,从而在翻译作品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她会努力进行作品译介和版权沟通并且与编辑沟通时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毕竟,译者既有为翻译而进行语言文字转换和意义再现的语言性,也有综合市场因素并进行相应调适的社会性(周领顺,2014:1)。或者说,只要译者打算让译作进入流通领域——市场,也就或潜或显地给译作赋予适应市场的商品属性。这首先表现在选材上,诚如葛浩文指出:“我看一个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喜欢,如果我觉得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洋人’的眼光来看。”(转引自姜玉琴、乔国强,2014:3-13)。“译者和编辑都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都希望把作品更好地推介出去,取得较好的传播、接受效果,以及一定的经济回报。”(覃江华、梅婷,2015:77)因此,译者和编辑实践过程中还要不断地与作者协商。这是译者在“忠实”原则下,确保市场阅读效果的一个有效手段。诚如葛浩文指出:“在西方,有天赋的编辑往往和作者反复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从编辑的视角、品味、经验及其对市场了解出发,对作品进行编辑、完善。”(孙会军、郑庆珠,2011:91)

### (三) 译者惯习对翻译策略与翻译效果的影响

“惯习”是指个人或者群体的言行及总体认

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它来自个体或者群体所处的特定“场域”，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随着经验变化，并且在经验的影响下强化调整自己的结构（冯冰，2012：4-7）。惯习助力场域的建构，从而形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总之都是个人作用于社会的综合产物。因此，译者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工作经验等形塑着其翻译惯习，而这些惯习反过来也会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韩斌早年在利兹大学学习中文，具备优秀的双语能力。她曾多次在复旦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大学讲授翻译技巧。韩斌用“倒走丝路”的精妙比喻来概述她与中国文学的结缘，她还组织中国文学翻译工作坊，她认为要通过翻译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架起一座桥梁，连通中西方读者的思想人文交流。20年来，她于翻译文学领域深耕细作，向英语读者介绍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作者与译者之间，是一种不安、互惠互利，且偶尔脆弱的关系。”（朱自奋，2014）因此，在《高兴》英译中，她努力与赞助人、出版商、以及原作者进行沟通交流，必要时也会在部分词语选择上与编辑沟通选定折中方案。所有这些社会轨迹都形塑了韩斌的译者惯习与翻译实践中采用的翻译策略。

在《高兴》英译本出版之际，韩斌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翻译《高兴》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方言翻译，因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负载词等对她来说是挑战，因此，她通过上网查阅中国西安美食以及与原作者沟通的方式，直到对文中提到的物品、农具等最终形象化理解后，再植入英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加以翻译。第二大困难就是要为西方读者找到一个可接受的形象，在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编辑间的相互妥协最终演变为一场“共谋”（collusion）（Bassnett, 2001：26）。韩斌认为译文本生产时的独特之处在于，倡导通过文化语境来实现“bridge the cultural divide”。如她认为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就是“卓别林式”的中国英雄（刘桂杰，2019：79）。因此在韩斌翻译过程中要去“英式形象”，因为亚马逊是美国出版公司，基于亚马逊编辑敏锐的感知，最终在编辑的建议下，韩斌将主人公换成了“美式形象”，以此与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视野相契合。

在翻译策略上，译者以读者为归依，主要采用

“归化处理”和“模糊处理”。

### 1. 归化处理

译者的“务实”在语言内主要表现为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以赢得读者的青睐；在语言外主要表现为采取归化的做法（周领顺、陈静，2018：116）。译者通常都是考虑到译文的可接受性与目标读者的心理期待进行调适，用归化处理以淡化对异质文化的陌生感。

例（1）原文：他说：城里贼多，抬蹄割掌哩！（贾平凹，2013：8）

译文：“The city’s full of thieves!” he said. It’s a dog-eat-dog world here!（Harman, 2017: 12）

例（2）原文：……我不知道挣钱不容易吗，可事情逼到这一步了，癞蛤蟆支桌子，只有硬撑着！（贾平凹，2013：63）

译文：Of course I knew that money didn’t grow on trees, but once we’d gotten that far, it was like a toad propping up a table: you had to just grin and bear it.（Harman, 2017: 119）

例（1）中动物的“蹄”指人的脚，具有文化意义。“抬蹄割掌”就是指“人不能抬脚，否则脚掌就会被割掉”，喻指城里的贼狠辣狡诈，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译者没有拘泥于原文的意象，而是按照译入语的理解通过意象替换或曰借用，用归化处理来再现原文的文化内涵，创造性地将“抬蹄割掌”译为“dog-eat-dog”（意为“无情的利己主义”），从而让英语读者更加了解中国古典特色文化词。例（2）中译者将“挣钱不容易”翻译为英文短语“grow on trees”，突出了文化性特征，同时也兼顾了译入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将“只有硬撑着”译为“you had to just grin and bear it”，其中用“grin and bear”（强颜欢笑）来表达“硬撑着”，传达了主人公“苦笑着忍受”这层含义，完美再现了《高兴》的主题，底层人物式的“含泪的微笑”呼之欲出，凸显出人性的光华（Toury, 1995：56-57）。这样有利于目标语读者走进故事语境，快速促发与读者的互动。

### 2. 模糊处理

译者对于一些文化负载词和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特有表达进行了模糊处理，避开了英语读者对中国特色文化的“陌生性”和“疏离性”，有利于站在接受者的角度对文本进行消解。

例(3)原文:清风镇人多地少,分给我的五分四厘地,二分是坡地栽了红薯,三分四厘是种着麦子,走时托付了邻居,讲好我能回去就不说了,若不得回去就让邻居收,收来能给我一斗麦就行了。(贾平凹,2013:129)

译文: Freshwind was overpopulated, and land was in short supply. About third of my patch was a sloping field. I'd grown sweet potatoes on part of the land. The rest was planted with wheat, and before I left, I'd asked my neighbors to keep an eye on it. We agreed that if I didn't come back, they could have the wheat and just give me a measure of grain. (Harman, 2017: 232)

例(4)原文:几乎中午不是带了些早上蒸好的馍打个尖,就是掏四元钱去吃一海碗扯面。(贾平凹,2012:45)

译文: Instead, what we usually did for lunch was bring along some ganmo from breakfast to keep us going, or spend four yuan on a big bowl of pulled noodles. (Harman, 2017: 67)

例(3)中的译文将中国测量单位“分”“厘”和度量单位“斗”进行了模糊化处理,把“二分”和“三分四厘”简化地译作“About third of”和“the rest”,将“一斗”这个中国度量单位译为英语测量单位“a measure of”(一量器……)。通过模糊化处理中国特色词,避免了译入语读者在文化上的理解障碍。这种翻译方法关照了译文的生存生态,将译语读者对原作的接受作为考量,体现了译者的文化性视角。例(4)中“打个尖”意指是在吃饭前,稍微吃点东西。译文用了模糊化处理的方式将方言转换为中性的非文化专项词语,译语在语体上更趋向标准化。这既考虑到了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又增强了可读性。

#### 四、结语

翻译实践是一种在社会语境下进行的社会性活动。本文将《高兴》英译本置于布迪厄社会学视域,从《高兴》译作成功的原因,场域、资本、译者惯习等对《高兴》英译本的影响逐一展开探讨,发现《高兴》英译本之所以能够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是因为世界文学场域的变化、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等综合形成的场域变化、亚马逊出版社雄厚的经济资本、原作者贾平凹在中国

乃至世界文学界的象征资本以及译者韩斌的文化资本和塑形的惯习等综合作用使然。这对贾氏小说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乏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 When Is a Translation Not a Translation [C] //In Bassnett, S. & Lefevere A. (eds. ).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6.
- [2] JIA P W. *Happy Dreams* [M]. Harman (tr. ). Seattle: Amazon Crossing, 2017.
- [3] Merkle Denise. Translation Constraints and the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Anthony Pym, Miriam Shlesinger and Daniel Simeoni (eds. ).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175-186.
- [4]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 [5] Wolf Michaela, Fukari Alexandra.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1.
- [6] 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 [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 [7] [法] 布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 [M]. 包亚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8] 冯冰. 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中国案例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9] 高园. 这是翻译最好的时代—汉学家韩斌访谈 [J]. 出版人, 2019 (10): 81.
- [10] 贾平凹. 高兴 [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2.
- [11] 姜玉琴, 乔国强. 葛浩文的东方主义文学翻译观 [N]. 文学报, 2014-03-13.
- [12] 梁红涛. 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研究: 以贾平凹小说的英译为例 [J]. 外国语文研究, 2019 (2): 91.
- [13] 刘桂杰. 《高兴》英译本发行背景下韩斌翻

- 译思想研究[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 77-79.
- [14] 刘晓峰, 马会娟. 社会翻译学主要关键词及其关系诠释[J]. 上海翻译, 2016, (5): 55-61.
- [15] 孙会军, 郑庆珠. 从《青衣》到 *The Moon Opera*——毕飞宇小说英译本的异域之旅[J]. 外国语文, 2011(4): 91.
- [16] 覃江华, 梅婷. 文学翻译出版中的编辑权力话语[J]. 编辑之友, 2015(4): 77.
- [17] 王阿静. 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高兴》的英译研究[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8(8): 79.
- [18] 王洪涛. 建构“社会翻译学”: 名与实的辨析[J]. 中国翻译, 2011(1): 14-18.
- [19] 王建开.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的出版传播及研究方法刍议[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3): 17-18.
- [20] 王悦晨. 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J]. 中国翻译, 2011(1): 7.
- [21] 吴赞. 《浮躁》英译之后的沉寂——贾平凹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J]. 小说评论, 2013(3): 72-78.
- [22] 武光军. 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J]. 外国语, 2008(1): 75-82.
- [23] 许钧. 翻译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24] 杨晓芳. 贾平凹《高兴》英文版全球首发[J]. 中国出版, 2017(17): 1.
- [25] 周领顺, 陈静. 语义求真与语境务实[J]. 中国翻译, 2018(5): 116.
- [26] 周领顺, 周怡珂. 西方编辑之于译作形成的响性——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西方编辑观述评[J]. 外语学刊, 2018(1): 114.
- [27] 朱自奋. 葛浩文: 作者与译者之间是一种不安、互惠互利的关系[N]. 文汇报, 2014-01-08.

## Analysis of English Version of Jia Pingwa's *Happy Drea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Li Ruon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Abstract:** From Bourdieu'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lements such as field, capital, and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can exert an impact on trans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guides us to explore the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road social context. Jia Pingwa's *Happy Dreams* is a bitter-sweet modern Chinese dream, which wa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painstaking efforts and was said to have conceived for five years, added and deleted several times, incisively portraying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Han Bin, a Sinologist, *Happy Dreams* was published in 2017 by Amazon Crossing, which is a model initiated and translated by Western Sinologist, and published by Western academic publishers. The paper is grounded on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attempting to analyze Harma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appy Dreams* in terms of field, capital and habitus.

**Key words:** Jia Pingwa; Sociology; *Happy Dreams*; Nicky Harman